



**An
Airline
Suite**

Chester Eagle

恰斯特·伊格尔

1933—

小说家。生于新南威尔士州南部的乡间牧场。墨尔本大学毕业后长期在维多利亚省的东吉普斯兰山区任教，同时从事文学创作。他的作品包括《谁爱夜莺》、《森林之家》(1984)《在窗畔》(1984)、《一起玩吧，黑色而忧郁的二十岁》(1986)等。《设计牧场》被评为1985年《时代》年书奖。1988年退休后专业从事写作。90年代，他的创作进入成熟和高产期，新作不断。继《维多利亚·恰利斯》(1991)后，又推出《音乐之屋》(1996)《韦恩拉特山》(1998)等长篇小说，以及反映澳大利亚土著人历史文化的《迪戈日多》(1999)。他的作品往往取材于某些生活经历，日常的所见所闻，朴实幽雅，善于刻画细腻微妙的人物内心世界和复杂的人际关系，揭示现代人的困惑和无奈的心境。由于他酷爱古典音乐，他的作品又具有独特的艺术美。

飞行组曲

坎塔斯^① I

飞行员说：“我们现在飞越弗罗姆湖，右边的乘客可以饱览它的风光。一会儿我们将飞过艾尔湖。”我坐在中间，无法往外看；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流逝，阳光从左舷窗照射进来，人们纷纷拉下窗帘。我沉思着下面飞越的地方：斯图特戈壁滩、辛普森沙漠、乌卢卢、奥尔格斯。我真想在这片土地上漫步；也真想坐在飞行员的座位上，透过头盔上的眼孔似的机头窄窗眺望山河。

飞行员是我们时代的骄子，他们漫不经心地提供一些对我们毫无用处的信息。“我们现在的高度是……机外气温零下……速度……飞机到达新加坡的时间大约是……目前新加坡的地面温度……如果你们要按新加坡时间对表，现在是……”现在我们在麦克唐奈山脉上空，正朝大沙漠飞行。大沙漠我得看看。我走到机舱后部，两个女人正俯瞰窗外。窗前没有座位，我就站在她们旁边。她们是法国人，我们就攀谈了起来，我说着大学毕业以来一直没有讲过的法语，仿佛已经部分地置身于欧洲了。她们想了解这片沙漠、土著人和探险者。向她们介绍这些，我感到自豪。我的祖国就在机翼之下，幅员多么辽阔，我们在她的上空已经飞了好几个小时。那色彩多么绚丽！我决定待在这扇窗前，直到红

^① 澳大利亚航空公司。

色的大地连接那熠熠闪光的大海。

一只手伸进我们中间，是一位服务员。他拉下窗帘，我又惊又怒地瞪着他。不看看这神往已久的美妙景色，坐飞机干什么？我这样对他说。对不起，他说，我们要放映电影，光线太强了会妨碍图像。我拉开窗帘。放什么电影！

放映的电影是约翰·特拉沃尔德和墨尔本的奥利维·牛顿·约翰主演的《狩猎季节》。服务员又拉上窗帘，那两个法国女人不见了。

在罗马，行李迟迟不到。他们在磨蹭什么？在烤栗子吗？我领到行李后又去买车票。妻子和孩子先上了公共汽车，我却撞上身边的一个男人。“对不起，”我说。他说了一个我以前还没听人对我说过的词。

我们进城时已经暮色苍茫。车子靠左行驶，但愿没有澳大利亚同胞迎面驶来。我发觉我们现在跨过的桥梁一定横贯在台伯河上，我们脚下流淌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悠久历史。凯撒园林在台伯河的哪一边呢？

我们在罗马终点站下车，步行时最先经过的一些建筑物破败不堪；在一个小安全岛上驻足时，还嗅到一股小便的恶臭。我们找到了国民旅馆。我在房间里揿了揿按钮，一个声音“嗯”了一声，于是给加上了一张床。我们决定先洗个澡。澡盆很大，有两个旋塞和一个狮子头。狮子嘴巴是出水口，但没有水。过了好一会儿，只听到点咕噜咕噜的声音，又等了片刻，方从狮子的牙缝中挤出几点温吞水。令人扫兴。

几年前，我在《生活》杂志上见过圣·彼得大教堂的全色照片。那雄伟的白色雕像，置身在群像中的基督俯视一条巧妙地向一端扩展的街道，给人一种迎面而来的感觉；意大利人善于玩弄欺骗视觉的花招。我在许多明信片上见到过圣·彼得大教堂，还在一些评介文艺复兴时期建筑艺术的书上见过它的剖析图，因而了解该领略些什么，但没料到它会突然映入眼帘。它凭借高耸的山丘，气势磅礴。在每天川流不息的人群中，我们四个只是微不足道的普通游客。明天又有另一群人，又有不同的人们乘着同样的车子，吃着同样的栗子，同样地买梵蒂冈的纪念品，同样惊诧地张大着双眼。基督是梵蒂冈这一场面名义上的统治者，他的十字架轻轻地挨着肘窝，右手平伸，颇似令人望而生畏的希特勒的敬礼模样。凭借基督的至高无上的尊严以认可教皇——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阳台——又依仗教堂的权威以认可其老气横秋的教廷大使和高级教士和藏头露尾的银行家，以及进入教堂后随处可见的普通教士。这批人的面目之可憎，决不亚于科林伍德足球俱乐部比赛时，看台上那批被威士忌和性欲涨红油脸的爱尔兰神父。我以为他们的体制是腐败的，但我一生中却从未见过如此崇高庄严的景象。米开朗基罗的《圣母哀悼基督》使我感动涕零；穹窿内壁上的金底黑字，书写着上帝通过其爱子颁发建造教堂的圣谕：你是岩石，我要在其上建立教堂，我要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你。我们回家时会怎么样呢？会面目全非吗？在一个月的瞬间？我们要访问佛罗伦萨（这里人称法伦兹）、米兰、日内瓦、巴塞罗那、赫罗纳、卡尔卡松、图尔兹。至此，声名远扬、举世无双的巴黎就近在眼前了。

然后返回墨尔本。难道我们只有一个自惭形秽的基础，还是除了欧洲的美妙之外还更有一种勃勃生机？

在从新加坡至巴林群岛的漫长旅途中，我拨弄着耳机。第九声道播送古典音乐，周而复始地重复着同一套节目。我算准埃尔加^①大提琴协奏曲的播放时间，戴上耳机。

声音很轻，一点也听不到。一会儿以后，我又试了试，这回听到了，是一个爱好观马、爱好与国王聊天的男人的内心独白，似乎音乐成了一种宫廷活动。可怜的埃尔加，当灵感未被激发时，他的乐句时断时续；可悲的埃尔加，生来就命中注定要表现迷惘，要记录他及其国王的王国从团结一致走向分崩离析的演变。当机声再次淹没音乐声时，我关上耳机，在想象中倾听他的第一交响乐，让那庄严的主旋律在我心中回荡。一切重大的事件都要经过疯狂、贪欲和残暴的阶段，才能使其本来的面目最终得到完美的表现吗？抑或仅仅是有些事件才会侥幸如此？他们的时代精神？他们的梦想？一想到那崇高的主题，我颇以为然。我又戴上耳机，刚刚开始播送舒伯特的C大调交响乐。世上还有比这更壮丽的乐章吗？

有。我想起了布鲁克纳^②，再次摘下耳机，想象他的第七交响乐的序曲。那音乐属于天际云端，属于我们现在身处的地方——远离贫穷的印度三万五千英尺的高空，既舒适，又令人厌烦。布鲁克纳的第八、第七、第四交响乐中的铜管乐都涌入我脑海；我花了一千一百零一元买的机票居然把我送到这世界的想象中心！

在再听舒伯特之前，我想起瓦格纳^③纪念先烈的音乐，想起

① 埃尔加(1857—1934)，美国作曲家。

② 布鲁克纳(1824—1896)，奥地利作曲家。

③ 瓦格纳(1813—1883)，德国作曲家和音乐戏剧家。

他的朋友路德维希王子，想起莱茵河畔的城堡，想起沃顿的辞别，想起自始至终贯串《大灾难》的主题，想起爱的拯救力量。

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如此浮想联翩。

坎塔斯 II

我们越过孟加拉湾，沿缅甸海岸飞行。在曼谷，我们在机场内转了一个小时，活动活动筋骨。自雅典至曼谷一段的航程中有许多空座位，我们可以舒展身体睡觉。当曼谷的旅客鱼贯登机时，其人数与机上的乘员数大致相同。好！舱门随时可能关上，我瞄准几个空座位，打算抢占。

这时，服务员开始清点空座位，并领着几个亚洲人上机。又领上几个。又领上了几个。那三五成串的亚洲人衣着褴褛，两手空空，从他们表情上看，都没有上过飞机。他们在服务员带领下络绎不绝，直到所有空座位只剩下我身旁的一个和其后面的一个。最后，这两个座位也被一个男人和一个怀抱婴儿的女人占去了。QF6 航班座无虚席。

婴儿睡着了。那男人会说几句英语，他们是柬埔寨人，在泰国边境的一个难民营里住过二年。他掏出文件，把难民营中一位美国管理员写的一封信给我看，信中表扬他学习英语和协助难民营的管理工作。该人有主动精神，那美国人信中说，肯负责任。我联想起自己写过的许多介绍信。“我们现在去澳大利亚，”这位柬埔寨人说，“我们新的家乡。”我问他，他妻子会不会说英语？“会一点儿，”他说。

过了几个小时，婴儿醒了，喂了奶。父亲抱过婴儿，用一块布片遮盖住他的眼睛，入睡后又把他交还母亲。这孩子使我深有感

触。他，或她，将不会对柬埔寨或泰国留下任何记忆，惟有我和这对父母才是这次飞行、这次他毫不知情的逃亡的见证人。命运、机缘、遭遇或者别的什么，使他飞出难民营而降落在我们的墨尔本。不难看出，那柬埔寨人满心好奇，只是不知道从何问起。他不时地越过我注视我的女儿和儿子。我儿子在欧洲时不断收集各种纸币和硬币，正在一件件地玩赏。那男人——谁出钱给他买机票的？——从表袋掏出一枚硬币，递给我儿子。儿子端详了一番，把它交给我。这是一枚币值仅高于最小币值的泰国钱币。我又递给女儿，她仔细看了看，对她弟弟说应该回赠点儿什么。儿子不明白为什么。他已经说过谢谢，也知道这枚钱币并不值钱；并认为这个男人既然是个男人，就一定有许多这样的硬币。女儿找出一枚五十澳分的硬币，从我面前递过去。“这，”她说，“是给你的。”

出人意料的是，那柬埔寨人似乎恐惧这块硬币，惶恐了好一阵子。我很尴尬。这五十澳分的硬币本来就不是一件成功的作品，不但那盾形纹徽图案被钱币的八角形紧紧框住，而且另一边印着英国女王的头像，简直令人反感；我鄙视女王，因为她是英国等级制度的柱石。我们这一代人难道还要与父辈一样，终生忍受这种侮辱吗？我为这块硬币上的图案涵义感到羞耻。然而，这柬埔寨男人却把它翻来覆去，百看不厌，仿佛只要诚心诚意地看着，就能看出他的未来前程似的。

当我们离开陆地进入海湾时，飞机遇上湍流，缺乏经验的乘客不禁大叫大嚷，机组人员以他们听不懂的语言安慰他们；一些乘客拿到牛皮纸袋，却不知道它们的用处。飞机平稳下来时，我算了算余下的航程，又把所需的时间减去二十五分钟，因为这是机头向下的时间：那时他们一定会晕机呕吐的。

他们中许多人果然不出所料。我的邻座也很吃惊。这时他已经把硬币装进衣袋，他回头看妻子，她微微一笑，揭开布片，让他看孩子的脸。婴儿仍然睡着。我们着陆后，我祝他们好运。谢谢，他说；谢谢你的硬币，他对我女儿说。

我们在夏尔·戴高乐机场。我妻子要留下搞研究工作，我和孩子们先回国。现在是两点钟——14：00——但阳光惨淡，好像要提前天黑似的。我们从法兰克福飞来，必须在这里换机。保安措施很严，进机场的乘客必须先进一个小房间，接受同性别的警卫人员检查；我脑海中浮现出一个词：“搜身”。检查在一条漫不经心地拉上的门帘后进行。我讨厌眼前的情景，于是坐了下来，反正时间还早得很。我妻子将进行另一种旅行：从与我们分手的地方乘地铁去旅馆，再去图书馆。她将离开我们独自生活几个星期。我深感肩负照顾孩子的重大责任。我们等待着，因为我不喜欢下面的一步：检查。

不久，我们看到不能再拖延的信号：一群有条不紊的——这是最恰如其分的描述——穿黑制服的男男女女穿过中转站，朝我们的入口处走来。他们是汉莎航空公司的机组人员，风度很潇洒，既不齐步走，也不排成二列或三列纵队；我以为他们的这种举止是很有意识的，很自觉的。他们步履轻快；当接近享有免检特权的入口处时，他们放慢脚步。一个神情威严、帽子上有穗带的男人从口袋中掏出一包薄荷脑。他一停下，其他人也都一齐站住。他说了句什么，其他人一个接一个地伸出一只手，他用手托住它们，同时让一只薄荷脑落在地上，不过女乘务员的手是悬空的，他的手只礼貌地在下面象征性地托着。他是机长。他们笑吟吟地经过警卫人员。

我们通过检查。我发觉刚才的犹豫与我外衣衬里上的破洞不无关系。德国的空中小姐十分迷人,还有吸引儿童的玩具,对此我很感激。在我们简短的航程中,天很快地黑了。北方的冬天里人们干什么呢?当我们渐渐降落时,我看到的是一片皑皑白雪,而没有被积雪覆盖的景物则包裹在一团比汉莎航空公司的制服略浅的蓝色雾气之中。我真有点觉得能够见到北欧神话中的熊黑和毒龙了。高度的文明怎么能在这样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发展呢?

飞行员说:“我们现在正处赫德兰德港北面,在穿越海岸线。周围云层较厚,但从右侧也许能瞥见港口。”我的座位在左侧,只能见到一团漆黑。我们坐着不动……并不增加安全……似乎可以不惹人讨厌。

时间慢慢过去,我知道我在期待地面的信号,但下面乌黑一片。这黑暗与中东的黑暗不同,那里的港口、石油设施,我想还有军事设施,当我们飞过时都会闪现出一簇簇令人迷惑的灯火,而机长对此却不加解释。

黑夜漫漫。我又习惯地计算时间;还需许多小时才能到家。突然,在一直蒙住我双眼的无边黑暗之中,闪出一点光亮。一点。

我竭力想象那是地面上的什么光亮。篝火?牧人住房?土著的村舍?我国的问题在于:越接近部落生活或部落生活的残余,越接近土著人,人们的态度就越莫名其妙。我舒舒服服地住在城市,与土著人的距离就像在飞机上一样遥远。所以,光亮早已落在后面了,而我却兀自对它捉摸不透。

二十五分钟后,机头开始向下。我爱声名远播、举世无双的巴黎,我发现我身上有法国人、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的气质;然

而,我渴望回家。

出租车载着我们穿过科伯格区。太阳还在小山背后,小山上是亡灵的住宅区——科伯格公墓。德谢纳体育场笼罩着淡淡的雾霭。我告诉儿女,当太阳升上小山时,雾气就会消散,它不像我们在赫罗纳、比利牛斯山和莱茵河上遇见的湿羊毛般的浓雾,没有附着力。当出租车驶上分隔科伯格区与普勒斯顿区的小山时,我们感到周身发热,脱下外衣。又十分钟过去后,我们下车;付车费之前,由于某种原因,我把手提箱放在屋门内,先嗅着这里的泥土气息,我们的黑色玄武岩风化成的泥土。这里白天生机勃勃,暑热还没有到来,但我喜爱我们家园里泥土中升腾起来的气息。

我们三人发疯似的在花园里奔跑着,一会儿抱起小猫咪,一会儿凝视着橡树林,一会儿又抚摸着——即使透过鞋底——那干燥的泥土,深深地呼吸我们在阔别中度过夏日时光的草木醉人的芬芳。

泰 航

我去巴黎开会。我身旁的座位又迟迟没有人坐,最后才被一位姿容艳丽的女人占了。她好像有点惴惴不安,过道上来往的乘客都会看上她一眼,乘务员也特别殷勤。当系安全带的信号解除后,一个胖胖的泰国人很惹眼地托了盘子走到她面前,盘子上放着一瓶刚打开的西班牙香槟和一只玻璃杯。她说她不喝酒,把杯子递给了我。我兴趣盎然,而且酒也醇和。她问我在读什么,我告诉她是我刚写完的书稿。这本书稿是我回墨尔本和悉尼之前在巴黎开始写的,现在想试试在这几个城市之外阅读的效果。她饶有兴趣地听着,并告诉我她是画家。我不相信;可能上过几个

星期的美术课吧。我问她从哪儿来，她说从法伦兹，我告诉她我第一眼就爱上了法伦兹；她嫣然一笑，说尽管如此，她还是需要旅行的。

她把护照给我看，上面盖了世界上半国家的戳记。她怎么会旅行了这么多地方？原来她是个模特儿，她的代理人为她订了个周游世界的计划。她把自己的照片给我看，确是天生丽质，有的自然大方，有的温柔娇羞。当我又开始阅读书稿时，她手握铅笔，翻开一本杂志，不耐烦地翻了一阵，然后不知从什么地方抽出一张对折的信笺，动作都是缓慢的。信笺外面用意大利文写着“我的小猫咪”。她翻开信笺，开头是“给我永恒的……”，末尾是“我永远爱你”。她凝视着、沉思着，过了好长一会儿才从手提包中取出本拍纸簿。问我有钢笔吗？我把一支在意大利买的钢笔递给她，可记不清那是什么牌子。“奥罗拉，”她高兴地说。她写信时，一个慕艳的男人走过来找她搭话，她被耳旁的声音吓了一跳，钢笔猛地掷在杂志上，光滑的页面上被洒了好几滴墨水。她显得很紧张。

当她写完复信，放入手提包时，我问了她的情况。她说她一直为悉尼的一位代理人工作，那代理人与一家英国人办的杂志有联系——谈到了该英国人的名字——她与他儿子刚刚相处了一个月，后者希望她留下来与他结婚，她回答说要好好考虑一下，必须回法伦兹才能决定……

我也身处爱河，与我爱人缠缠绵绵，刚度过一生中最幸福的几个星期。在巫山云雨的陶醉中，我认为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但“永恒”、“永远”这些词汇却使我不安。她说她告诉他——她说了他的名字——“我也许会答应的，但要回家后才能弄清自己的想法。”

她在曼谷下飞机。我带上钱在机场购买部转悠。我在看丝绸时发现帕特茜亚——她护照上的名字——站在我身旁。她嘱我不要到机场买东西，市区卖的什么都比机场卖的价廉物美。她还说我的书如果出版有困难，可以找……她说了她爱人父亲的名字，他办着一份杂志……他一定会帮忙。我们道过再见。六年后我才再去法伦兹，在那里待了三天，根本没有想起她。仅仅是现在，在写这篇文章时，我才回忆起当时意识到的危险，“永恒”，“永远”这类令人忧虑重重的词语所造成的墓穴，已经使地面都千疮百孔了。

一个瘦小的泰国商人占据了帕特茜亚的座位。他的业务是把亚洲的货物运送给欧洲的餐馆供应商店。他让我看了他的价目单。“这只是近似价，”他说。当吃完饭并收掉餐具时，他掏出计算器，在廉价的黄纸笔记本上写了一阵，然后拟出货单和报价，接着又计算起来，我瞥见他精确到计算出三位小数。

他递给我一份英文版《曼谷邮报》，上面登着一张农民要求政府提高农产品价格的示威游行的照片。他告诉我必须为他们采取点措施，否则他们就会变成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我发现他始终没有提及他们的怨怒之一，就是贪婪的中间商侵吞了他们种植水稻的收益。以我的标准看，他的衣着大概只有合作商店的质量，因此，他也许没有把自己归入侵吞农民利益的中间商之列。

飞机上有一群旅行社组织的法国人，他们有的与别的乘客交换座位互相聊天，有的三三两两站在过道上。离我最近的一个看模样是农民，但他用法文说自己是农场主，为尼姆市郊的一家葡萄生产合作社种植葡萄。我问他在巴黎买酒，怎样辨认他们的

产品,他支支吾吾半天说不清楚,最后拿出一只瓶子,颇似墨尔本艺术展览馆中施泰尔画的器皿,贴着粗糙的长方形商标,上面印着“加尔省卡斯蒂埃埃出产的戈多·弗拉维/VDOS”。我说我会留意买这种酒,而他似乎不大感兴趣。飞机在雅典降落时很平稳,这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但这批法国旅客却为之鼓掌。我很纳闷,他们这几个星期的旅行,每次着陆时难道都是这样的吗?希腊人下了飞机。

最后一段航程中,机舱像散了伙的营地,乘客仅满员的四分之一,大多是那群法国游客,外加几个去巴黎的澳大利亚人。我们或转来转去聊天,或眺望窗外景色,或躺下睡觉,并且自己安排喝酒、喝咖啡,因为服务员已经不管我们了,他们只在瑞士上空给每人发了一朵代表该航空公司的兰花。另一个胖墩墩的泰国人碰碰我的手臂,要我看那个瘦小的泰国人。“他太拼命了。”他说着抓起一条毛毯,向一排空座位走去。一会儿后我经过他身旁时,他已经呼呼入睡了。终于,系安全带的信号响了,前面就是夏尔·戴高乐机场。

在这次旅行中,我感到泰航飞行员操纵他们的巨型客机与澳航飞行员有点不同。他们不是高高地接近机场,然后自信地节节下降,而是关掉发动机,让飞机缓缓滑翔。这种操作方法使发动机发出隆隆巨响。我笔直地端坐着,想起离开墨尔本之前度过的几个星期。我在热恋之中,不能想象因为在法国降落就失去与前几个星期的联系。我想起乘出租汽车去机场前的漫长的一天:我放过一张巴伦博因公司灌制的柏辽兹《安魂曲》的唱片。我喜爱这首乐曲的许多表现手法,其中之一就是这位作曲家首倡的十六面褒贬迥异的定音鼓。那飘逸的鼓声,与其说作用于感官,

不如说旨在让大地发出共鸣。我固执地抱着这一带到法国来的爱好,从发动机沉闷的隆隆声中聆听鼓声,向机翼下云障雾蔽的景色中观看欧洲的神秘;我双手抓住座位,相信一切都不曾因为让爱情毫无保障地听天由命而有所变化。我们着陆、下机,进入令人诧异的、似在翻山越谷的通道,通道尽头像是一块三向的电盘,尽是电梯、站车和走道。我沿路标经走廊搭电梯找到公共汽车站,那里停着好几辆公共汽车。我想了一下要去哪里,就跳上了车。司机用法语问:“国民旅馆?”我准备法郎。“对,国民旅馆。”并说了声:“谢谢!”

泰航Ⅱ,坎塔斯Ⅲ

在穆弗塔大街,有人问我圣·艾蒂安·迪·蒙教堂怎么去。我做了个很费劲的手势给他指路。我在一家酒店要那农民说的那种酒,掌柜不屑地说他们已经不从那个地区进货了。我给女儿买了把雨伞,喝了杯啤酒,信步走到圣·艾蒂安教堂,那里正在排练巴赫的一部清唱剧。

我尽量缓步而行,但起伏的心潮却不能自己。来杯啤酒,还是咖啡?我返回旅馆,见泰航的紫色兰花在烟灰缸上晃荡。

几天后,我好不容易找到残废军人教堂,因为这是《安魂曲》首次公演的地方。我竭力想象它在被辟为拿破仑陵庙之前的面目,想象阿伯内克放下指挥棒而吸其回忆录中十分著名的鼻烟时,柏辽兹该站在什么地方呢。我步行穿过巴黎,来到《赞美曲》脱胎问世的圣·厄斯塔什教堂。《三圣曲》中有一段小提琴合奏,我相信柏辽兹的初衷一定是要我们听听天使翅膀的颤动声。像我这种不再相信天使的人们,居然坐在教堂中间,试图从自己的感受中发现柏辽兹所表现——或者说“体现”吗?——的精

神世界，似乎有点奇怪吧。这种精神境界如果能够企及，那一定是在哥特式教堂中；如果这种精神世界能够企求，那我一定能够达到，因为每当听到柏辽兹的《三圣曲》，我都觉得它就在我的心灵深处。所以，我敛神聚气，沉思默想，一心要不凭作曲家的音乐而在自己的心灵中发现这种境界。我端坐着，让思想自由驰骋，直至感觉到心中一片恬静。这当然只是初步的，但我觉得有点入门了。

这时，我瞥见一个两天前见过的乞丐溜进门向我走来。教堂中没有别人。突如其来的怒气取代了心境的恬静。我瞪着他，攥紧钱包，憎恶地耸耸肩膀。我的态度很粗暴。两天前，我这样静坐时，他也这样溜了进来，我叫他不要干扰我的思想。而现在他又来了。我对他大声嚷嚷，他却把两个手指塞进嘴巴，说：“施舍点吧！施舍点吧！”我又喝斥他，一边怒气冲冲地站了起来。今天听不到天使翅膀的颤动了！我走向教堂深处，凝视着克罗凯的大风琴，那是《赞美曲》首次演奏前一年配置的。我尽量让自己平静下来，但毫无结果。施舍点，施舍点，让他去吃他妈的糕饼吧！

这怒气主要是冲我自己发的，因为我不能视若无睹地对待乞丐，对待罗马街头骚扰游客的吉卜赛人，对待西班牙手抱被麻醉的睡婴行乞的女人，还有纸上写着不幸遭遇要你阅读的男人（有时是衣着体面的男人）。你说不懂他们的语言，但他们知道，你自己也知道他们知道你懂得很。施舍点吧，施舍点吧。他们就是要你的钱。这是欧洲土地上最使你意识到自己不是欧洲人的一大特点。

回旅馆途中，我在巴黎圣母院坐了一会儿，在莎士比亚书店浏览了几本书，还发现一家出售精彩乐谱的商店，给一位歌唱家朋友买了几首普朗克的歌曲。回旅馆途中，很高兴竟有法国人两

次向我问路。啊，是的，我觉得很自在，绝无置身异国他乡的感觉。我跨进一家我最喜欢的酒吧，写了几张明信片。

我在学生时代曾听美术教授约瑟夫·伯克讲过，他在大战期间乘飞机去雅典，飞行员告诉乘客窗外可以见到巴特农神殿，但约瑟夫安坐不动，因为巴特农神殿的设计是要人们徒步登临，抬头瞻望，而不是让人居高临下去俯视的。

我从那时起就迷上了乘飞机，教授的观点也深深地印在我的脑际，每次飞进飞出雅典，我都不让自己去俯视巴特农神殿。但这仅仅是一种姿态，因为我禁止自己眺望奥林匹斯山。从飞机上看，奥林匹斯山并不那么高，在被剥夺了宙斯及其众神的今天，只是一座普普通通的石头山，光秃秃的，毫无奇特之处。然而，飞越它上空时，我却有点赞赏古希腊人的信仰体系，在当时是很杰出的。我想，他们的想象一定与真实世界密切相关的……

我为什么喜欢飞行？回答是：那使我，使任何人拥有天神的视野。“天神”是什么意思？没有什么，因为已经没有天神了，因此我们必须对自己负责，对我们草率处置的地球负责。还有个问题，我们能够继续生存下去吗？

没有回答。

我们在希腊上空的云层中穿行。透过缝隙的诱人的阳光，斑斑块块地映照在海面上，斑斑块块的光点之外是黑黢黢的一片。岛屿像一块块的礁石。海上没有风暴，但浓云翻滚，我不禁想起“云涛”这个字眼。海面上的明暗急剧地变化着，仿佛在以光与影的变幻重演我们不能目击的沧海桑田的史实。

我们越过意大利半岛的尾端，沿着山峦飞行。大地——机翼

下的大地——如同破旧的黑色的天鹅绒，残缺不全却富有视觉效果。一处处悬崖上组成一个个山顶集镇的各个建筑物，活像一颗颗钉在货箱上的钉子，使我联想起古代宗族间的宿怨和仇杀。当山峰越来越高，山腰间覆盖着皑皑积雪时，飞机改变了航向，因为我们要在罗马菲乌米齐诺的奥尔多·达·芬奇机场降落。飞机穿越罗马这座不朽之城的上空时，机身有点颤抖，但我的儿女仍兴高采烈地认出他们知道的名胜：圣·彼得教堂及其前面令人惊叹的广场，广场上排成一行行长串的汽车；椭圆形的竞技场；古罗马的大广场……肮脏、破败的市区，车水马龙，拥挤不堪。我们兴奋、激动地从头顶的衣物柜中取出行李，系上安全带。喀嚓，喀嚓，喀嚓，机舱中一片扣安全带的声响。

在新加坡，我坐在紧挨机舱隔墙的最前排。后来上来一对怀抱婴孩的夫妇，他们需要使用固定在舱顶的摇篮，请我换座位。为了要我答应，他们满脸笑容，彬彬有礼地问了些“你哪儿上飞机的？”、“离家多久了？”之类的问题。

我的新座位在一个女人的旁边，她在伦敦待了八年，还不清楚自己想不想回家。这使我产生一种感觉，如果家中什么人需要照料，那就只有召回未婚的女儿。

几小时过去了。我们飞越祖国的海岸线。我把手表校准墨尔本时间。我的至爱亲朋即将进入梦乡了吧，我欣慰地思忖着在巴黎为他们买的礼物。坐在我前面的那对夫妇喂过婴儿，拍拍他的背部，逗他玩了一阵，然后铺好座位上方的摇篮，等他睡熟后，把他放进摇篮。当飞机在气流中颠簸时，摇篮也随之晃动。我想起那对柬埔寨夫妇；这个婴孩也是父母不在澳大利亚而是在异国他乡出生的。这婴儿还太小，眼睛还不会对光。他现在的处境

象征着他那无能为力的状态：双重的依赖，双重的悬空。

我无法坐着入睡，于是就看书，就频频注视窗外，就等待黎明。我想俯瞰内陆地区的地形，想俯瞰沿地下水走向而蜿蜒生长的林带，想俯瞰那充满神秘感的大地——它像土著居民用圈圈点点和弯弯曲曲的线条绘成的图画。然而，我此时此刻最渴望的是回家，是看到自己的家园和故土。

天终于破晓了，云雾很稀薄。我们在一片茫茫大地的上空，下面实在还是一无所见。这时，我前面的那个男人醒了，很兴奋。他把婴儿抱出摇篮，紧紧地搂着。当在微熹的晨光中，地面上的景物依稀可辨时，他抱着婴儿凑到窗前：“看，杰弗里，”他说——我第一次听到他叫孩子的名字——“这就是澳大利亚！看！这就是澳大利亚啊！”他的手哆嗦着，我深受感动。我问自己，他是让孩子看澳大利亚呢？还是让澳大利亚看他的孩子？

我们离开陆地，进入菲利浦湾，又越过维多利亚地界。二十五分钟，飞行员使机头朝下，我们进入了墨尔本的低空。我能看到我居住的地方，看到我工作的地方了。然后，飞机对准跑道，在一片农田上空渐渐降落。我想起身边在伦敦住了八年的妇女，提出把窗边的座位让给她。她换了座位，大概很感激我，而我则越过她的肩膀，凝视着窗外的橡胶林和干枯的草地。“上帝，澳大利亚真美啊！”我说，她朝我看了一眼，仿佛不大明白该作何感想。